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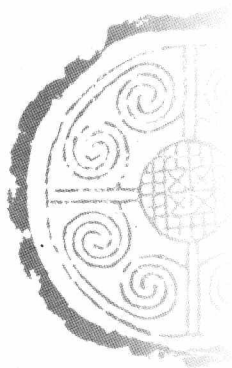
朱德发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XIAN DAI WEN XUE SHI SHU XIE DE LI LUN TAN SUO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朱德发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209-05375-4

I. ①现… II. ①朱…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研
究—中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8359 号

责任编辑:曹玮娜

封面设计:彭 路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0mm×230mm)

印 张 22.5

字 数 30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375-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4)6216033

绪言 总体逻辑思路与理论创新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教育部便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学系的二级学科而正式设立，并制订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随后出现了个体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先后问世了多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代表性的版本有《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著）。这些现代文学史大都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书写框架，逐步纳入“兴无灭资”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运作，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越来越政治化，及至“文革”十年，除了鲁迅几乎所有现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流派都贴上“封、资、修”的政治标签，统统地进行横扫，这就没有文学史可写了。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学文科教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恢复了正常秩序，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掀起了新的热潮，集体书写的不同形态与版本的现代文学史的问世，持续不断；在突破、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致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由政治型向人本型发生了转换，并且冲决32年时空的中国文学史学科，提出了收编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为分割的三个学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学科范畴，以及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6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等，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立于21世纪的时代高度，回望60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丰富实践，既有可贵的经验需要总结，又有沉重的教训值得记取，也有深刻的规律等待开掘，更有新的领域召唤发现。从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的研究，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对“编纂史”的梳理，发表或出版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开拓性的著述；然而它们大都侧重于文学史文本的评述，编写史的梳

理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本书在汲取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则重在突破,重在发现,重在创新,这也是它的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所在。

所谓“突破”主要是指突破新民主主义理论及机械阶级论对研究主体思维的禁锢,自觉地坚持“文学是人学”的人本思维对60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实践重新洞察与考析。“回望篇”的三章,既从纵向上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由政治型向人本型转换的艰难探索过程,又从横向上阐述了政治型与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的不同特征,不只是对政治型文学史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并且也对人本型文学史的特征与优长从理论上给出新的解释。

所谓“发现”主要指发现已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新提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60年中国文学史学科等,各有其长处更有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唯有建构新学科方可形成21世纪现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大格局。建立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时空界限仅仅32年,书写对象由革命文学扩大到新文学,或附加点通俗文学;对于这个学科的严重局限不难发现,而新时期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却早已“破门而出”,从纵横两个维度不断向外扩展。“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或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虽然把百年的所谓近、现、当代的文学史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文学观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观,解决了32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局限问题;但是却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或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至少有两大局限自身不能解决:一是它将“改造民族灵魂”作为文学母题只是彰显了启蒙文学系统,而其他文学系统得不到公正公平的对待;二是20世纪的历史时空只能涵括百年中国文学,而21世纪正在延展的中国文学就容纳不下了。至于60年中国文学史学科,虽然它以“五四”人的文学生成到“文革”人的文学毁灭作为一个完整周期来构成中国文学史框架,易于展示现代文学的运行轨迹与内在规律,但是笔者发现它同32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或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一样,存在一个严重局限,即研究和书写的对象都是新文学或现代型文学,建构的文本只能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性文学史,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形态的复合的整体的文学史。也就是说,它不能反映中国 56 个民族是一家的文学发展的全景观与总面貌。这既不符合现代中国多元共生文学的互动发展诉求,又不合乎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大国强国对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要求。而要解决和克服这个严重局限,首要的任务在于重建新的学科范畴、新的文学史识、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主体思维等。

所谓“创新”主要是从理论上探索如何重新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力求突破已有的学科意识、文学史观、价值标准、思维定势,建构起创新型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学科篇”三章,提出了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设想,它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相比较,“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语序的调换,而是两个内涵与外涵不同的学科范畴。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即,现代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里所有样态的文学都是平等关注的书写对象;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其他的非新的非现代性的文学形态就不宜于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畴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或 60 年中国文学史学科也同样包容不了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样态。虽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命名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钱基博就使用过,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学科的理论范畴却是笔者于 2002 年公开提出来的,既从理论上阐述了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充分根据及其功能特征,又探讨了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在地域上的三大版块和在本体上的三大版块。“史识篇”三章,论述了以“文学是人”的人本文学史观作为统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与中心线索,把各个系统或各种形态的文学内在地质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现代中国文学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共同体。“价值篇”三章,对已用过的价值标准特别是新与旧、“左”与“右”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运用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所产生

的利弊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它们都不能对现代中国大家族的各态文学作出平等相待、公正合理的价值评判；只有重建重释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真善美为三个亮点的价值评估体系，才有可能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各态各色文学作出公正公平的评价，真正消除新与旧、雅与俗、现代与传统、“左”与“右”等价值标准对现代中国文学评述所形成的偏见。

“思维篇”三章，着重探讨主体思维在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过程中应发挥的功能效用，尤其对发散型主体思维对新史识、新见解的发现功能，收敛型主体思维对史料的搜求、辨识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了有深度有力度的论析。至于“评述篇”三章，只是择取三部有创意的文学史书写文本，运用人学文学史视野从特定的角度切入进行评述，所获得的新见解新史识以充实或补助现代中国文学史理论。

本书约 30 万字，从不同维度或层面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和书写在理论上所作的探索，有见解上的创新性，有逻辑上的系统性，有操作上的适用性。因此它的出版不论对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推动现代中国文学既深且广的研究与活跃现代学术文化，都将会给予理论上的启示和智力上的支持。

既然是理论探索，那就难免错漏，恳请方家读者批评匡正。

朱德发

草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

目 录

绪 言 / 1

回望篇

政治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 2

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 24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 58

学科篇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 74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四个基本特征 / 88

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三大板块” / 102

史识篇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念 / 126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 157

现代文学史观的探索及其意义 / 179

价值篇

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 / 194

探询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与旧认知模式 / 226

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的“左”与“右”认知结构 / 238

思维篇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思维的沉思 / 256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发散型思维 / 283

现代文学史料索辨的收敛型思维 / 308

评述篇

坚持“以人为本”文学观修史的成功尝试

——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 / 323

创造性书写 登上一层楼

——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 338

建构地域文学史学及其范本

——评《山东文学通史》 / 345

后 记 / 352

回 望 篇

政治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政治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建国后 30 年主要是“十七年”，作为国家体制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所遵循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框架，它呈现出的恪守政治化书写规范、彰显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强调所谓阶级分析、坚持绝端对立政治思维等，构成了政治型文学史的基本特征，对它给现代文学史书写带来的得与失以及经验教训，本文作了沉重反思。

诚然中国现代文学于晚清至“五四”历史区间生成，从此便有了史迹的存在；但是以历史的视野和特定的史识对其观照与书写却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盛于 30 年代，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其各卷由新文学创建者执笔的导言，则可视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是这样，不过 1949 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大都是自发的民间的，多是个体的自由的书写行为，所有的文学史文本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态，或是 10 年间、20 年间的断代史，或是古代文学史附加上的“尾巴”；只有到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有了新政权，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纳入体制内运作，此后才成为国家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和学术建设、文学发展的一种自觉行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已确立新文学、新文化、新学术的大政方针、路线纲领，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尚未真正启动，1950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对课程内容提出了原则要求，划出了特定范围，并责成学者作家共同拟订《〈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以下简称“大纲”），公布于世^①，新文学史书写方真正开

^① 发表于 1951 年 7 月《新建设》杂志第 4 卷第 4 期的“学术讨论”专栏。

始。当时的学术空气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对“大纲”可以自由讨论，不过“大纲”所规范的内容却呈现出“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框架轮廓，从四章的设计上看并未突出中国新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征，每章重在强调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是为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学习方法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新文学的特征“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文学发展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发展”、“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发展”、“大众化（为工农兵）方向的发展”、“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对于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亦是依据《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历史划分。显然，这个“大纲”脱胎于《新民主主义论》，旨在从新文学史的角度来印证、论述和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由此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就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而新文学史本身的独立系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严格地遵照这个“大纲”，真正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中国新文学演变的客观实际出发，那么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即使是政治型的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尝试，也是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一种范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 1951 年版，下册 1953 年版，简称王本）、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 年版，简称丁本）、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 年版，简称刘本），可视为依据《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理论框架书写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本。不过激进政治思潮的一次次冲击和政治斗争的逐步扩大化，不仅不断地改变着原订教学大纲的政治规范，也不断强化着书写主体的政治意识与思维方式，致使新文学史书写者的紧跟政治风潮的盲从意识越来越强，而独立思考的智从思维则越来越弱；因此所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均属政治型的，但政治化的程度却是有所区别的。如王本文学史虽未出离政治型的新文学史大纲，而它本身所具有

的学术性、创新性和科学性却并未因其遵循政治理论模式而影响其重要的史学价值与开拓意义。建国至“文革”30年实际上“十七年”，根据政治理论框架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数量不少，而且这诸多文学史文本并非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都是雷同化、模式化，是你抄我、我抄你的因袭之作，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书写者的良苦用心与学术追求；尽管如此，然而从实质上看这些新文学史文本毕竟是政治型的，对其相似的或趋同的政治特征应该给出实事求是的评述，绝对地肯定或绝对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现下不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或者硕博研究生对政治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读的很少，甚至有的学人连王瑶本文学史也不晓得，更有甚者把政治型文学史视为“垃圾”。这种否定一切的学术倾向不能完全怪责青年学者们，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政治型文学史缺乏严肃的科学研究和认真的理性反思也有关系，不能总是把对它的认识定格在批判极左思潮上，现在应该冷静思考与论析政治型现代文学史文本的政治特征及其经验教训。

从理论设想与写作实践的结合上，对于所谓政治型文学史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即：将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纳入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规范，不论文本构成的逻辑结构、观照新文学的文学史观、评述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或者书写主体的运思方式、话语表述，都不能脱离既定的政治框架或政治思维。这种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虽然与新文学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有密切关系，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绝对不能混成一团。固然，新文学与政治的胶结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客观基础与翔实史料，否则政治化的书写就不可能从中国新文学客体中提炼抽绎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文本，故而绝不能抹煞或忽略它们之间在政治内涵上的这种联系，新文学的“新”中或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里都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含量；但是新文学与政治这种纠葛关系与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又有显著的区别，政治化书写是把所有新文学，即新文学运动、新文学思潮流派或新文学作家作品都统统纳入政治规范，完全按照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思维进行取舍、评价和叙述，使那些与政治不搭界的或与政治无关的或根本摆脱政治羁绊的新文学，遭到淘汰、贬抑或批判，而使那些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有关的新文学得到过度的推崇、拔高和阐释，形成独尊新民主主义文学而排斥疏离其他新文学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偏向，这样的文学史文本成了地道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甚至是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阐释史，而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景观的新文学史。倘若现代文学史书写，能以求真务实的史笔既揭示出政治因素的介入充实了文学的审美内涵，政治之于文学不是外加的因素而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能展示出文学与政治结缘是新文学现代化的必然维度，不是损害了新文学的美学品格而是为其增添了异彩，那这样的书写不是政治化而是学术化、科学化；如果现代文学史书写唯恐陷入政治化模式而有意识忽略或避开文学与政治的已然关系，无论选取何种理论框架或文学史观来书写现代文学史，那这样的文学史文本也是不完整的不科学的，史学价值或美学意义都会打了折扣，所以历史地真实地写出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看成是政治化书写。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政治框架，这是政治型文学史的基本特征。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非审美意识形态，尽管它以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雄辩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特征，并因新文学是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故也间接指明了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然而就新文学纵横交错的总体结构系统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政治框架主要强调了线性的时间维度，而且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它只能容纳新文学客体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不是全覆盖，尤其遮蔽了新文学运行的特殊规律与审美特质，着重凸现了新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实质。但是并非所有子系统的新文学内涵都能揭示出这种政治性质，不少的新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品缺乏

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倾向，特别是反帝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相当匮乏，这样就使不少新文学形态被遗漏或被贬斥。而在现代文学史写作实践中，治史者为了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政治性质，并把这种政治思想性质作为贯穿文学史的主导线索，则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所谓策略：或从文学作品及其他史料中寻找个别证据，发挥其以一当十的实证效用，来证明现代文学史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性质，其实这种孤证或虚证并不具有以少胜多的逻辑功效，只能给读者一种大帽子戴在小人头上的极不相称的阅读反感；或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微言大义，对其进行过度阐释，尽力上纲上线，去迎合那个宏大的政治判断，这种并非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给文学史书写带来的是一种虚假现象，从而亦说明宏观的政治结论难能从微观上找到足够的根据给出强有力的逻辑证明，导致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文本失去了扎实严谨的品格。当然也有的文学史书写如王本，只是在“绪论”和有关章节中引用不少宏大政治理论，从表面看似乎把中国新文学史置于政治理论框架，实际上并没有紧密联系新思潮、新流派、新创作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好像仅仅给新文学史身上披了一件又宽又大的政治外衣，其本体依然是或大致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丰实形态，这正是王本文学史至今仍有不朽价值之所在。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王瑶的《史稿》实际上有两张皮，他已经就当时所能领会到的教育部意图，给自己的著作披上了一层政治的皮，在‘绪论’和文艺斗争等有关章节引用了很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的观点”；“但他毕竟还有另一张皮，准确地说不仅是皮，更可说是一幅骨架子，那就是从朱自清那里继承来的，掌握尽可能全面的史实（不管是哪个派别的），按照文学自身的特征（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诸门类）为历史搭架子，对它们的成就作客观的评论”。^① 这种两张皮现象的形成，既不能说明书写者对政治理论框架理解不透，又不能说明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史实不熟，也不能说明他的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96页。

学术功力不深，只能说明书写者是位“真学者”，不想昧着学术良知说大话说谎话；并从此也看出教育部为新文学史书写预设的政治框架是相当空泛宏大的，与新文学的充盈史实有吻合之点更有不合辙之处，硬性地强迫治史者就范那是写不出货真价实的新文学史的。特别是“大纲”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为充分肯定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性质，竟断然否定了“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新文学现代属性；难怪有些政治型的新文学史文本或者根本不写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和“国语文学”以及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采取回避或抹煞态度，或者把它们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对象，以此为对立面来衬托新民主主义文学。读了这样的新文学史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写或批判“白话文学”等四种类型的主张与文本，那新文学岂不成了空中楼阁，五四文学革命创建的新文学还有什么可言？连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绩也扫荡了，那以何为史实来透析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性质？由此可以想象依据这种政治理论框架来书写新文学史有多么难，即使挖空心思地写出的新文学史文本也难能经住实践的检验与历史的考验。

二

彰显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作用，这是政治型中国新文学史的根本特征，也是判定新民主主义文学政治性质的关键之维。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文学，而这一判断则昭示这样的逻辑关系：若没有或缺乏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那新文学就不可能表现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题，若没有或缺乏新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主题那就难以体现出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正是领导思想与文学性质的互为因果相互印证，决定了开掘和凸现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既是政治型文学

史的本质诉求，又是治史者的政治责任，因此在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无不绞尽脑汁地寻找“史实”或探察“根据”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从生成到发展都是遵循无产阶级思想轨迹运行的。如果证明左翼文学、苏区文学或工农兵文学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那是较为容易地从理论与作品的结合上得到验证的，而其他新文学形态就相当困难了；即使再困难也不能怀疑已有的政治“定论”，这就迫使治史者在凸现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领导这一政治命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难免走进了一些误区。而这些误区是治史者当时的认识达不到的或者就是有所认识也要闯进去，哪怕出现误认误判总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险少。虽然我们对这种处境和心态不必苛求，应该给予谅解，但是为了总结书写文学史的历史经验教训，使重构文学史文本不再重蹈旧辙，就不能不对这些误区作点探讨。

从理论上讲，怎样才算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实现了真正领导，也就是既获得了话语权又在创作上显现出效果？对此并非所有的治史者都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大多是以“无限崇拜”的情感心理取代了冷静的理智思考，不是去进行学术探索而是追踪“大势所趋”，往往由智从陷入盲从，连起码的政治常识也不闻了。依据政治常识，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不是自发的盲动，既要有思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又要有一定的组织保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只有结合中国新文学具体实践制订相应的路线政策，通过组织的运作，才有可能把巨大的思想力量转化为推动并引导新文学诞生与发展的物质力量。如果以此为理论根据和价值标准考察并判断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导，那首先应该从史实出发，让史实说话，然后从史实与学理的结合上作出合乎逻辑的令人诚服的科学结论。

综观“十七年”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引用了现成的“政治结论”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缺乏有充分证据的具体分析，即使具有经典价值的王本文学史也是如此作，至于丁本、